

## 医学古籍中人文思想的现代价值

刘晓琴

**[论文摘要]** 中国医学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内在的文化动力，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树起了崇高的道德规范和历史丰碑，成为中华文化遗产中灿烂的明珠，也成为后世医务工作者思想道德和精神的楷模，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医乃仁术的儒家仁爱思想。“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强调仁者爱人，而医学正是推行“仁”道的最佳途径。行医治病、施药救人就是施仁爱于他人，儒家的仁爱思想因此也成为医学道德的理论基础。二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理念。孙思邈说：“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成为中华传统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三是清正廉洁的传统道德规范。“德者，才之帅也”。“德行者本也”。传统医德十分强调医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强调做人的道德观念和行医准则，主张无德不可学医、无德不可为医。四是精勤不倦的民族敬业精神。敬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就主张“事思敬”、“执事敬”、“修己以敬”。在中国的传统医学文化中，历代医圣名家都强调了为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必须具备孜孜不倦、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

**[关键词]** 医学古籍 人文思想 现代价值

中国医学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奇观，推动了世界文化、文明的进程。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同自然灾害、瘟疫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华医学，留下了丰富的中医古籍，其中蕴含的医学文化思想和人文精神，千百年来，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

### 1 医乃仁术的儒家仁爱思想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所谓“仁”就是“爱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强调仁者爱人，而医学正是推行“仁”道的最佳途径。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为医者，最重要的应当有仁爱之心。行医治病、施药救人就是施仁爱于他人，儒家的仁爱思想因此也成为医学道德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史上，医儒不分，儒家思想为医学伦理思想及医学理论注入了强有力的活力，

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想的主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族认同性。<sup>[1]</sup>

“仁者爱人”，面对病人的痛苦、百姓的灾难，掌握医术济世救人是医家最好的仁爱惠心。具“仁心”，行“仁术”，做“仁人”，成为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理想选择。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仁心仁术”赋予医学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强化了医生职业的神圣与高尚，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伦理的仁爱、仁慈和仁义观，成为古今医家普遍遵守的职业伦理道德原则。

唐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千金方·序》中自述其从医的缘由和过程：“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sup>[2]</sup>。孙思邈将幼时病痛的经历化作对医学的执着和对病人的同情，由自己的病痛想到天下百姓的病痛，将爱己的心扩大到爱“天下人”的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儒家“仁者爱人、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可以说在孙思邈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有仁爱之心，才能博施济众，对所有患者都“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有仁爱之心，才能做到“勿避险巇”“一心赴救”；有仁爱之心，才能“省病诊疾，至意深心”。没有了仁爱之心，就缺少了对患者心灵的呵护，再先进的仪器，只能带来令人生畏的冰凉；没有了仁爱之心，就缺少了对他人苦难的关怀，再精良的医术也会失去人性的温暖。“医乃仁术”，简单而朴实的四个字，却概括体现了医学的真正精髓，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生命至上的仁爱思想<sup>[3]</sup>。

## 2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理念

以人为本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萧纲《劝医论》说：“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尚书·泰誓上》：“惟人万物之灵”。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说：“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他把自己尽毕生心血写成的两部方书命名为《千金方》，就是因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成为中华传统

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

医学是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命科学，对生命的轻视和对人性的冷漠是医家的大忌。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关注人们的生命，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财富。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疠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sup>[4]</sup>

可见，早在古老的周代就设有分管医疗的医师，并把治病救人作为宗旨，以医治的效果作为考核医生和制定俸禄的依据。这种以人为本救济天下的思想就是对百姓生命的最大关爱。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人的生命是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医者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不论贵贱贫富，一视同仁；不计名利得失，一心赴救。孙思邈以病人为本，全心全意为病人考虑，对待求治的病人他不分贫富贵贱、老幼美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珍爱生命，成为后世行医者的楷模。

医学与人的生死安危密切相关，要真正尊重生命的价值、实现生命的价值，从医者就必须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自觉意识。我国古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达就是基于人为贵、人命至重的思想，出于对百姓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从根本上说，医学治病救人的宗旨是通过对人的“关怀”来体现的。从传说中神农遍尝百草的滋味、天下水泉的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到伏羲画八卦，得以类推百病医治的原理，尝试百药而创制九针的医术，“以拯夭亡”；到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再到孙思邈的精勤不倦，大医精诚；乃至李时珍不顾生命安危，亲自试服草药，完成了伟大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孕育于久远的古代，经过历代医药家们的言传身行，得以不断地传承演进，并成为医学和医疗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经久不衰。因此，历代的医学前辈们在开展医疗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催生了中华医学“以人为本”的原始医德<sup>[5]</sup>。

### 3 清正廉洁的传统道德规范

“德者，才之帅也”。“德行者本也”。传统医德十分强调医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强调做人的道德观念和行医准则，主张无德不可学医、无德不可为医。早在战国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指出：“非其人

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医学是复杂而高深的学问，“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不有志于民者不教，不有志于医者不传，这样才能保持医学的真谛，才符合医学的道德。

宋代林逋《省心录·论医》中明确指出：没有“恒德者”，不可以当医生，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之所在。清代医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第一要懂得儒理，然后才能知晓医理。这些论述都强调了为医者的道德修养，这是行医救人的前提条件。

明清时期，关于医学伦理道德的著述繁多，论述广泛，名医大家们精辟的论述和见解，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伦理学思想。主要有李梴的《习医规格》，喻昌的《六不失》；龚廷贤的《医家十要》、《病家十要》；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的《祝医五则》；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张璐的《医门十戒》；徐春甫的《庸医速报》等，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医学文化的繁荣和昌盛。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舍身而取义者也。”荀子主张以义制利，重义轻利，提倡君子“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朱熹说，为义就是“向圣贤之域”，为利就是“趋愚不肖之徒”。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清正廉洁的理想人格对传统医德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医古籍中众多篇章都记载了古代医家重义轻利、清廉正直的言行和品德。

晋代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指出：医生，不是忠厚廉洁善良的人，不可以相信。医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说：不管病家年龄的大小、身份的贫富，不管他钱财的多少轻重有无，“当尽力一例施与”；凡是来看病的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不可以向他收取药钱，只能送药。再遇到贫穷困难的人，也应当量力赠送，这才是仁术。清代名医费伯雄在《医方论·序》中更是明确提出想要救人可以学习医术，而想要谋利则不可以学医。假如我自己有病，“望医之救我者何如”？假若我的父母妻子有病，“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澹矣！利心澹则良心现，良心现斯畏心生”<sup>[6]</sup>。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批评了当时企盼权势、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他说：奇怪当今社会上的读书人，竟然不重视医药，不精心研究救人的医术，只知道争相追求荣华权势，仰慕豪门权贵，“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他要求学

医的人不要被名利所诱惑，不要贪图权势，专心于医业，救人生命。

#### 4 精勤不倦的民族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就主张“事思敬”、“执事敬”、“修己以敬”，“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古代思想家朱熹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在中国的传统医学文化中，历代医圣名家都强调了为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必须具备孜孜不倦、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

《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孙思邈在《千金药方》卷一《绪论》第一《大医习业》中要求医生：“凡欲为大医……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sup>[2]</sup>。孙思邈不仅是医学大家，同时精通儒、道、佛及诸子百家，这些名家经典不仅增加了孙思邈的见识，也对他的精研医学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我看当今的医生，不考虑探究经文的含义，用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而是继承各自祖传的医技，始终沿袭旧法。查询病情，只追求口才敏捷；面对病人一会儿，就处方用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所以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的是“多闻博识”、“视死别生”；李时珍爱读古典著作，就如同吃了蜜糖一样，他搜罗百家著述，博览群书，稍有心得就写下来。医术的高明源于他饱读经书，博闻强记，只有勤求古训、精究方术，才具备了“苍生大医”的基础。

正因为医学的博大精深，经方的玄妙深奥，所以只有用心精微的人，才可以和他一起探讨医学问题。如果用最粗浅的思考去探求最高深的医学，难道不危险吗？孙思邈批评了社会上有些愚昧的人，读了三年方书，就认为天下没有什么病值得治疗；等到治了三年病后，才知道天下没有总是对症治病的良方可用。因而学医的人“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步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sup>[2]</sup>。必须广博深入地探求医学的渊源，并精心勤奋，毫不厌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方能精通医术，明辨病因，成为大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病家两要说》所述：“然必有小大方圓全其才，仁圣工巧全其用，能会精神于相与之际，烛幽隐于玄冥之间者，斯足谓之真医，而可以当性命之任矣”。只有掌握精湛医技的人，才可以担当性命的重任。而高超医术的获得，必须要有精勤不倦、刻苦钻研的精神。

中华医学文化思想灿烂辉煌，中华医学人文精神光彩夺目。中华医学古籍中这些光照千古的医学文献，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内在的文化动力。中华医学史上这些名垂千古的医药学家，不仅学识渊博，医技精湛，更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树起了崇高的道德规范和历史楷模。

#### 参考文献:

- [1]. 刘国强. 加强医学生中华医学优秀文化思想的教育[J]. 医学教育, 2003(5): 25-26
- [2].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宋本, 1955: 序 6, 绪论 1-2
- [3]. 褚詹玄. 古代医学仁爱精神的现代价值[J]. 医学教育探索, 2010, 9(1): 114-116
- [4].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 黄侃. 周礼注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71
- [5]. 刘淑霞. 以人为本: 中华医学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8, 21(3): 133-135
- [6]. 清·费伯雄. 医方论[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 1

**作者简介:** 刘晓琴(1965-), 女, 汉族, 江苏盐城人,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硕士, 省高校哲社类研究会会员, 研究方向为医古文与医学人文。

地址: 盐城市解放南路 263 号

邮箱: [lxq5618@126.com](mailto:lxq5618@126.com)

电话: 15950202065